

《传习录》语录体英译模式对比研究：以亨克与陈荣捷译本为例

邓燕, 王旭雅, 戴淑慧

江西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西赣州, 中国

【摘要】《传习录》作为王阳明心学思想的核心载体, 承载着中国哲学独特的“语录体”文体特征。本文立足于文体学视角, 选取早期汉学家亨克(Frederick Goodrich Henke)与现代儒学大家陈荣捷(Wing-tsit Chan)的译本作为对比对象, 系统探析了两者在处理语录体“对话性、简约性、现场性”特征时的差异。研究表明, 亨克译本采取“散文体译述”模式, 陈荣捷译本则坚持“语录体复现”模式。二者的差异揭示了从早期汉学普及性改写向现代儒学学术性传播的话语变迁, 为中国典籍外译在“可接受性”与“本真性”之间的平衡提供了重要参照。

【关键词】《传习录》; 语录体; 翻译模式; 亨克; 陈荣捷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哲学典籍《传习录》英译模式及其传播研究”(编号: 20YY12);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编号: SZZX25219)

1. 绪论

《传习录》作为阳明心学的语录体经典, 其英译研究多集中于文本结构比较, 如陈荣捷对原文形式的忠实保持与亨克向散文体的结构性改造(刘孔喜, 2019, 2022; 赵秋荣等, 2024)。然而, 现有成果尚未深入揭示译者如何在“保持语录形式”与“顺应目标语规范”之间进行策略抉择的内在机制。为此, 本文从文体学视角出发, 通过系统对比亨克与陈荣捷的译本, 旨在解析二者在处理语录体核心特征时所呈现的翻译模式差异, 进而探讨其背后的译学逻辑与文化动因。

2. 《传习录》语录体的文体特征与翻译

《传习录》承袭《论语》《孟子》传统, 是体现“知行合一”思想的语录体著作。宋明理学“语录体”以师徒口传心授、即时对答为特征, 是兼具现场感、启发性的讲学实录(陆月等, 2025)。其文体特征主要表现为三方面: 一是对话性, 以“爱问”“先生曰”等标志词构成“叩答模式”, 体现思维交锋; 二是简约性, 文辞凝练, 寓“微言大义”, 如“心即理也”, 需读者体证贯通; 三是现场性, 保留口语特征与情境描写, 使抽象义理具身可感。英译此类文本, 需在形式转换中处理上述特征的跨文化传递。

语录体是一种融合了“对话性”、“简约性”与“现场性”的、极具“体证”特色的话语实践。然而, 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明白晓畅的翻译目的(靳铭吉等, 2023)、副文本注释(邓燕等 2025)、语录结构、引语形式(唐思珏等, 2025)等方面, 而对“体证性”这

一核心特质在译入语中如何传递的微观机制尚未深入探讨。基于此, 为深入揭示语录体典籍在跨文化翻译中的意义演变机制, 本文将突破传统的宏观结构对比, 深入文本微观层面, 旨在揭示中国哲学这种独特的“体证”言说, 在异质语言中如何得以保存、转化或重构。

3. 《传习录》语录体译本差异比较

3.1 对话性差异: 散文化重构与对话性还原

对话关系普遍存在于言语交际之中, 对话性是话语的本质属性(王永祥等, 2012)。《传习录》采用语录体形式, 其本质在于“对话”的生成与展开。这种对话不仅承载着知识的传递, 更蕴含着儒家礼治社会下的师生伦理。亨克与陈荣捷在处理这种“对话性”时, 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翻译倾向。

亨克译本体现出明显的“散文化重构”倾向。他将原文跳跃的问答结构处理为逻辑连贯的散文叙述, 具体表现在: 频繁使用“I made inquiry regarding...”等转述性短语替代直接引语; 在答语内部添加大量逻辑关联词; 为每个对话单元添加概括性小标题。这些手法虽然增强了文本的系统性与可读性, 却将口语化的即时对话转化为书面化的哲学论述, 削弱了原文的即兴感与情感张力, 使译本更像一部结构清晰的学术著作而非现场对谈。相比之下, 陈荣捷译本则致力于“对话性还原”。他严格保持“问一答”的并置结构, 直接采用“I asked:...”“The Teacher said:...”等简洁句式, 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对话的即时性与互动张力。这种处理方式更贴近语录体的文本本质, 再现了师生间应机而发的对谈特质。

这种宏观的“散文化重构”与“对话性还原”的差异，在具体语句的翻译上也体现得非常明显。下例的分析将表明，这不仅是结构选择，更体现在主语的人称选择、衔接句的叙述逻辑等细节上。

例 1: 先生叹曰: ‘此说之蔽人久矣, 岂一语所能悟? 今姑就所问者言之。……’ (王阳明, 2008:3)

“The Teacher, sighing, said: ‘This is an old evasion. Can it be fully explained in one word? Following your order of questions I will make reply……’ ” (Henke, 1916:50)

The Teacher said with a sigh, “This idea has been obscur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people for a long time. Can they be awakened by one word? However, I shall comment along the line of your question……” (Chan, 1963:7)

原文“岂一语所能悟?”是一个身处对话之中的反问,其主语“人”(被蔽者)和“悟”(觉醒)的动作均被隐含。亨克译本采用英语常用的非人称主语结构,译为“Can it be fully explained”,以“it”指代前文的“evasion”(此说),将对话焦点集中在观点、学说本身,呈现出一种客观、疏离的客体对话模式,弱化了原文的对话内互动,偏向客观论述。陈译本则译为“Can they be awakened by one word?”以“they”明确指代“people”(世人),牢牢守住了对话的原有参与者框架。此译法将教师对学理流弊的痛心疾首,直接转化为对“受蔽者”能否醒悟的关切与诘问,还原了对话现场中教师面向学生的教化姿态。

在翻译承上启下的“今姑就所问者言之”时,差异同样显著。亨克译为“Following your order of questions I will make reply”,其核心“order”一词引入了外部叙述逻辑,暗示回应将按某种预设顺序展开,功能上更似作者向读者预告论述结构,服务于将对话重构为条理清晰的散文。陈荣捷译法的核心“along the line of your question”体现了对提问思路的承接,紧随“I shall comment”则自然转入引导性阐释,还原了教学中“因问而导”的动态过程,再现了原文循循善诱的教化式对话立场。

3.2 简约性差异: 化简为繁与以简译简

语录体的核心魅力在于“简约”,用尽可能少的语言形式表示尽可能多的语义内容(程邦雄, 胡良 2005)。语录体的“简约性”,不仅指向“微言大义”的语义密度,更内生于其口传对话与即兴点拨的文体特质。这种简约

既体现为核心范畴的词汇级高度浓缩,亦表现为句式结构的短促并置与节奏张力。亨克与陈荣捷的译本在这两个层面呈现出的根本差异:亨克选择以形式上的“化简为繁”提升哲学概念的可理解性,而陈荣捷坚持以“以简译简”的方式维护原文的凝练物质与概念体系的完整统一。

(1)核心哲学范畴: 扩展阐释与浓缩对译

哲学典籍英译的关键,在于对核心哲学范畴进行跨文化意义的重构。在《传习录》中,这种重构首先体现为对“心”“理”“知”“物”等高度凝练范畴的翻译,其策略直接决定了译文“简约性”的成败。这些范畴如同思想的枢轴,以最小的语言形式承载着最富弹性的哲学涵义。译者对其的处理,直接决定了译文在词汇层面的“密度”与“浓度”。

例 2: 心即理也。(王阳明, 2008:3)

The mind itself is the embodiment of natural law. (Henke, 1916:50)

The mind is principle. (Chan, 1963:7)

原文“心即理”是一个高度凝练的判断命题。亨克采用“the embodiment of natural law”来翻译“理”,通过添加“embodiment”和“natural”等成分,将一个单音节概念扩展为一个解释性名词短语。这种译法以西方自然法传统的“客观规律”为参照,虽在类比中增强了语义透明度,但“natural law”一词具有强烈的西方哲学本体论预设,无形中“理”这一兼具本体、伦理与实践意味的范畴静态化与客观化,在提升可理解性的同时,稀释了原文范畴的多义性,从而可能在无意中模糊了阳明心学与西方某些客观主义哲学之间的界限。

相比之下,陈荣捷则坚持使用“principle”这一相对抽象、中立的哲学术语进行翻译。译文在结构上实现了对原文“微言”特质的还原。通过这种高度对应且不加修饰的名词化直译,他并非追求一词一义的绝对准确,而是旨在英语学界建构并维护一套自洽的宋明理学概念体系,使核心范畴在译语中仍能保持其内在的哲学张力与阐释空间,更贴近中文概念“以字载义”的凝练特质。

(2)句式形态: 解释性长句与警策短句

语录体的“简约性”在句法层面,表现为对并列、对仗等短句的偏爱。这种结构刻意省略显性逻辑连接,通过语义单元的并置与形式的对称,在概念间建立起直接而强劲的张力。其句式上的极致紧缩,不仅强化了思想的密度,更以斩钉截铁的语气赋予哲学命题一种箴言

式的权威效果。

例 3: 无心外之理, 无心外之物。(王阳明, 2008:6)

There are no principles but those of the mind, and nothing exists apart from the mind. (Henke, 1916:59)

There are neither principles nor things outside the mind. (Chan, 1963:14)

原文采用两个并列的六字否定短句, 形式工整, 节奏短促, 以不容置疑的并列断言宣示了心学本体论的核心主张, 极具宣言式的冲击力。亨克通过添加解释性结构 “but those of” 与动词 “exists”, 将原文两个并置的短句扩展为一个逻辑关系明晰的复合长句。这种做法在句式上将 “并列断言” 转化为 “解释性陈述”, 虽提升了句内逻辑的显性度, 却弱化了原文短促对仗所营造的那种直接的、不容分说的修辞力量, 语录体的警句效果因而减弱。陈荣捷则巧妙地运用了英语中同样具有格言色彩的 “neither... nor...” 否定并列结构, 将原文的语义并置转化为高度对应的形式凝练。这种处理在极简的措辞中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文的紧凑结构与绝对语气, 使译文本身如同一句自足的哲学警句, 再现了原文以形式之 “简” 承载命题之 “重” 的修辞效果。

3.3 现场性差异: 体证情境的隐化与显化

语录体之美, 在于 “发言立论灵活自由, 其中的日常对话具有 ‘如聆警咳’ 般的现场感” (熊湘 2024)。这种文体记录的不仅是思想的本身, 更是思想在特定情境中 “生成” 的鲜活过程。译者如何处理这种 “现场性”, 决定了目标语读者能否跨越文本, 进入心学特有的、强调亲身 “体证” 的实践话语空间。亨克与陈荣捷的译本, 在 “现场性” 的再现上呈现出 “隐化” 与 “显化” 的根本差异, 具体体现为对情境空间的指涉方式与对心学实践的话语塑造两个层面。

(1) 情境再现: 空间指涉的在场与缺席

语录体中的比喻往往信手拈来, 与即时、具体的教学情境深度嵌合, 是其 “体证” 逻辑的有机部分。以王阳明借树木指点 “孝心” 的著名譬喻为例:

例 4: 譬之树木, 这诚孝的心便是根, 许多条件便是枝叶。(王阳明, 2008:3)

Compare it to a tree. This truly filial mind constitutes the roots; the many details are the branches and leaves. (Henke, 1916:52)

Compared to the tree, the mind with sincere filial piety is the root, whereas the offshoots are

the leaves and branches. (Chan, 1963:8)

在现场教学中, 这个比喻极可能源于对眼前树木的 “指物为喻”。亨克使用不定冠词 “a tree”, 将原文中情境化、空间化的具体指示, 转化为一个泛化的逻辑类比。比喻由此脱离了具体的教学现场, 成为抽象的说明工具, 其 “体证” 所依赖的共在空间被 “隐化”。相反, 陈荣捷选用定冠词 “the tree”, 在语用上构建了明确的情境指涉, 暗示对话双方共享对 “这棵树” 的注意。这一细微的词汇选择, 在译文中重构了 “在场” 的视觉情境, 生动还原了语录体的互动特质, 将哲学点拨设定在可感知的、具体的空间经验之中。

(2) 话语方式: 静态阐释与动态体悟

语录体的论证魅力, 常蕴含在生动譬喻所激发的即时 “体悟” 中, 其语言本身即是一种实践引导。对话态与时态的翻译选择, 深刻影响着这种 “体证” 过程能否被传递。

例 5: 先生曰: “如何讲求得许多? 圣人之心如明镜, 只是一个明, 则随感而应, 无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 未照之形先具者。” (王阳明, 2008:7)

The Teacher said, “How can so much be acquired? The mind of the sage is like a bright mirror. There is only brightness there, and thus the response will be true to the influence brought to bear upon it. It will reflect everything truly. Past forms do not linger there; nor does it need to prepare for those which it has not reflected.” (Henke, 1916:74-75)

The Teacher said, “How can he study everything? The mind of the sage is like a clear mirror. Since it is all clarity, it responds to all stimuli as they come and reflects everything. There is no such case as a previous image still remaining in the present reflection or a yet-to-be-reflected image already existing there.” (Chan, 1963:27)

原文学生问, 圣人应对万变, 是否需要预先学习研究? 王阳明以 “明镜” 作喻回答。在阐释 “心镜” 之喻时, 面对 “随感而应, 无物不照”, 亨克通过使用一般将来时 “will be” 与 “will reflect”, 将 “心镜” 感应描述为一个恒常、可预期的规律性反应。这种处理将即时性的动态 “体悟”, 静态化为一种关于 “属性” 的客观描述, 脱离了教学对话中引导 “当下” 体察的语用目标。陈荣捷则通过 “as they come” 这一状语, 精准捕捉了感应发生的即时性与过程性, 并使用 “image”、“present

reflection”等视觉性、空间性语汇，将抽象的“心体无滞”落实为可被“观想”的具体心理意象。其话语方式始终在模拟并引导一种动态的、即时的内心觉察过程，从而再现了语录体在论证中实现“体证”的独特力量。

4. 结语

本文从文体学视角比较了亨克与陈荣捷的《传习录》英译。亨克采用“散文体译述”模式，通过散文化叙事、解释性扩展与情境隐化，建构了一个清晰连贯、易于西方读者进入的心学体系，体现了翻译作为跨文化阐释的能动性。陈荣捷则坚持“语录体复现”模式，通过对话还原、概念对译与现场显化，在英语中存续了原文的文体特质与体证精神，确立了学术翻译的典范。两种模式分别代表了“诠释沟通”的传播路径与“本体存真”的学术路径，对中国哲学典籍外译如何平衡“可理解性”与“文本本真性”具有重要启示。

参考文献

- [1] Chan, Wing-tsit. *Instructions for Practical Living and other NeoConfucian Writings*[M].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3.
- [2] Henke, F. G. *The Philosophy of Wang Yang-ming*[M]. London and Chicago: The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 1916.
- [3] 程邦雄,胡良.古汉语简约性的语言学分析[J].修辞学习,2005(1):51-54.)
- [4] 邓燕,杨瑶.译者身份对注释策略的影响研究——基于《传习录》亨克与陈荣捷英译本注释的语料库分析[J].江西理工大学学报, 2025 (6):98-104.
- [5] 靳铭吉,许雁.论译者的汉学家身份对典籍翻译的影响——以俄罗斯汉学家列·谢·贝列罗莫夫译《论语》为例[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23 (3):129-136.
- [6] 刘孔喜,胡琴.作为教育行为的《传习录》英译与传播[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2(3):89-93.
- [7] 刘孔喜.离散译者陈荣捷与《传习录》英译[J].中国翻译, 2019 (6):52-60+191.
- [8] 陆月,姚爱斌.“语录出而文与道判”:宋代理学语录生成的文体语境与思想动因[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5):215-225.
- [9] 唐思珏,朱健平.博采众长述而不作——陈荣捷英译《近思录》注释体系研究[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5 (1):100-109.
- [10] 王阳明. 传习录 [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8.
- [11] 王永祥,潘新宁.对话性:巴赫金超语言学的理论核心[J].当代修辞学, 2012(3):40-46.
- [12] 熊湘.何以载道:理学语录在宋代的话语论争及意义建构[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4):94-105.
- [13] 赵秋荣,孙培真.译者多重身份对译者行为影响路径的语料库考察——以《传习录》英译本为例[J].外国语文, 2024(1):131-143.